

CERAMICS GALLERY
OF THE PALACE
MUSEUM · PART I

故宫陶瓷馆·上编

故宫博物院 编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YZLI 0890088151

CERAMICS GALLERY
OF THE PALACE
MUSEUM · PART I

故宫陶瓷馆·上编

故宫博物院 编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总 目

序言 / 郑欣森	004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概况 / 耿宝昌	008
中国古陶瓷美的历程、欣赏与展示 / 吕成龙	011
当代陶瓷史研究述评 / 杨静荣	029
故宫陶瓷馆藏品目录	048
故宫陶瓷馆藏品	057
相关词汇释义	510
故宫陶瓷馆藏品款识示例	520
文华殿简介 / 吕成龙	527
文华殿平面图	528
故宫平面图	529
中国古代主要陶瓷窑址分布示意图	530
后记	531

序 言

郑欣森

新的陶瓷馆的建立，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大事。

故宫藏瓷多达 35 万件，几近院藏文物的四分之一。陶瓷研究历来亦为故宫博物院的科研优势。20世纪 50 年代，故宫博物院就开辟陶瓷陈列专馆，并在 1985 年和 1995 年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改陈。1995 年的陶瓷馆设在乾清宫西庑，展出面积约 700 平方米，尽管条件有限，但仍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从 2002 年开始的故宫大规模维修，有个整体的规划，把殿堂的修缮与其使用功能结合起来，对全院的展览格局作了较大调整。作为维修试点工程的武英殿，竣工后辟为“绘画馆”，使 14 万件书画及 40 万件的典籍、书版有了充分展示的场所；与武英殿对应的文华殿，则作为新的“陶瓷馆”，这两处成为故宫博物院两大收藏的专馆，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时，新的“陶瓷馆”也是继“珍宝馆”、“钟表馆”、“石鼓馆”、“绘画馆”四大馆改陈后的第五个专馆陈列，在故宫的展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华殿区域是故宫的一处重要建筑。从午门进入故宫，正对面是太和门，太和门东是文华殿，西为武英殿，文武对峙而立。文华殿为工字殿形式，有院门，前后两进，正殿名文华殿，歇山式屋顶，饰金龙和玺彩画；后殿名主敬殿，正殿前的左配殿为本仁殿，右配殿为集义殿。文华殿在明初为讲读经筵之所，后为太子之东宫。嘉靖十五年（1536 年）复为皇帝经筵之地。明末李自成烧了文华殿，清沿明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重建。当时曾有人作《文华殿赋》，赞美它的绝美：“启丹枫之左翼，睇紫禁之东隅；地界图书之府，星临角亢之墟。前曰文华，后曰主敬。”乾隆时，文华殿还是殿试阅卷处，殿试后由皇帝钦命八员读卷大臣在此阅卷，并共同挑选出前十名试卷进呈御览。光绪二十年（1894 年）至二十四年（1898 年）间，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各国使臣，接受他们呈递国书。民国时期，文华殿曾作为古物陈列所展陈文物的一个主要场所。现在把这一重要宫殿辟为陶

瓷馆，说明故宫博物院对陶瓷展览的重视。文华殿面积 1000 平方米，也利于展览内容的连贯性。

新的陶瓷馆在展览内容、形式设计和电子展示三个方面都有新的创意和突破：

一 展示内容上的变动和改进

1985 年和 1995 年陶瓷馆的两次改陈，在陈列内容上虽有所改进，但变动不大。例如两次改陈在所选展品的年代上均截止到清代嘉庆、道光时期。1995 年进行的改陈，只是更换过小部分展品，多数展品多少年也没有动。此次改陈，吸收了近 10 年来国内外在古陶瓷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在陈列内容上作了较大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更换展品。充分利用故宫陶瓷藏品丰厚、可靠的优势，尽最大可能更换展品，使绝大多数展品都是首次公开亮相，力求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

首次批量展出清宫所藏洪武官窑瓷器。明代洪武官窑瓷器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古陶瓷研究领域的热点。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批清宫遗留下来的洪武官窑青花、釉里红瓷器，以往从未展出过，外界亦很少有人知晓。此次挑选部分精品予以展示，相信会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

首次展出明代“空白期”瓷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虽然天灾人祸不断，但从文献记载看，景德镇御器厂并未停止烧造活动。只是由于这

三朝瓷器均不署正规年款，致使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三朝瓷器的认识模糊不清，故曾有“空白期”或“黑暗期”的说法。近 10 多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三朝瓷器愈来愈多地被辨认出来，其真实面目逐渐清晰起来。故宫专家对藏品认真研究后发现，故宫亦不乏这三朝瓷器的收藏。此次展出几件精品，希望能有助于观众对这三朝瓷器有更多的了解。

首次将“转型期”瓷器作为一个主题予以展示。在从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到清代康熙中期（约 1676 ~ 1700 年）将近 100 年的时间里，随着农民起义的蓬勃发展，直至摧毁明王朝的统治和清入关，中国社会曾发生剧烈变革。作为全国制瓷中心的景德镇，其瓷器制造业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万历三十五年以前，景德镇的制瓷业是由官窑占统治地位，此后官窑急剧衰落，民营瓷业则因国内和亚欧市场需求的刺激而渐趋兴盛，并跃居主导地位。以往人们曾将 17 世纪景德镇的制瓷业称为“转变期”或“转型期”。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大批这一时期的瓷器，以前很少公开展出过，此次在陶瓷馆将其作为一个主题予以展示，尚属首次。

首次将清代晚期官窑瓷器作为一个主题予以展示。清代晚期官窑瓷器是故宫博物院陶瓷收藏中的强项，不但数量大，而且精品多。以往由于展览场地的限制和人们对这一时期官窑瓷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

陶瓷馆中一般不展示这一时期的瓷器。近30多年来，关注清代晚期官窑瓷器的人愈来愈多，人们迫切想一睹皇宫藏品的风采。此次陶瓷馆改陈特将清代晚期官窑瓷器作为一个主题予以展示，以供观众研究鉴赏。

二 形式设计上的创意

在借鉴以往陶瓷馆展示的基础上，新的陶瓷馆的设计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尊重古建原貌。新陶瓷馆的馆址文华殿是故宫外朝东侧的一座重要建筑，其殿内雕梁画栋，地面为民国时期铺设的彩色瓷砖，上下呼应，和谐完美。考虑到古建本身的装饰美，所以在设计展览时决定保留原有地面，不再铺设木地板。既不破坏古建的原貌，又使其环境与展示内容相吻合。

展览设计宗旨。陶瓷类文物本身就具有色泽华美、流光溢彩的特点。为了使展览达到突出文物、营造欣赏陶瓷氛围的目的，在陈列形式上坚持了简约而不简单的宗旨。

灯光的改进。展览灯光的运用是一个展览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灯光运用的目的是让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件文物所包含的信息。这次灯光的设计从每一件文物的特点出发，并考虑展览的整体效果，采用普通照明和光纤照明两套系统，重点文物和需要突出的重点部位，则加强光纤照明。通过灯光的艺术照明让文物具有“活”感觉。以往博物馆展览的灯光基本是

从上、下两个方向给光，这次改为根据文物所需从不同角度给光，使观众能够了解不同文物的重点。例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采用从展柜周边向文物中部打光，用灯光来突出该件文物腹部的精美花纹，用灯光展现出文物的层次，用灯光使文物更具风采。

文物说明牌的设计。文物说明牌是每件文物的基本信息，如名称、年代、收藏地点等。陶瓷类文物在鉴别上有一个重要的部位，就是底部的做法以及是否有款识。考虑到观众的需求，这次在每件文物说明牌的设计上，附上相应文物的款识，以使一般观众和专业人员了解和掌握陶瓷款识变化的规律。

展室环境的设计。为充分展现和烘托陶瓷文化的氛围，在展室环境的设计上，拟在展柜上方采用大幅陶瓷图形的版面，一方面弥补了文华殿太高，而展品过小的矛盾，另一方面巧妙地遮挡文华殿高大窗户的自然光源，并防止紫外线进入展室。

三 在电子展示方面的创新

新陶瓷馆将特别开辟电子展示区域，用各种生动的电子展示手段帮助观众全面地欣赏故宫藏瓷，了解陶瓷的知识。

在电子展示区域里设有：

视频播放区。在播放区里，悬挂的大屏幕将循环播放三维动画《景德镇制瓷》以及视频片《从陶到瓷》、《陶瓷之美欣赏》、《故宫历代藏瓷》、《故宫陶瓷学者》

等。《从陶到瓷》讲述了瓷器从陶器演变而来的过程；《陶瓷之美欣赏》则是帮助观众欣赏中国陶瓷在各个不同时代体现出的独特艺术魅力。另外，由故宫博物院古陶瓷专家出面讲述故宫藏各时代陶瓷特色的《故宫历代藏瓷》，是观众学习或总结故宫藏瓷特色的最佳课堂。《故宫陶瓷学者》则是介绍故宫对陶瓷研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体现故宫陶瓷研究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信息互动区。此区里设立了多个触摸屏。触摸屏的内容将以“故宫藏历代陶瓷”、“清代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争奇斗艳——彩绘瓷”、“巧辨明清官窑瓷年款”、“五颜六色——颜色釉瓷”、“薄色晶莹——釉的制成”、“鸭蛋窑探秘”等8个主题来介绍故宫特色藏瓷、瓷器的工艺技巧以及辨认方式等陶瓷知识，围绕着主题还将设计一些有趣的小游戏，以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电子说明牌。展柜边的电子说明牌将对展柜内的展品做更加细致周到的介绍。电子说明牌突破了展柜内普通说明牌文字的局限，而且可以随着展品的更换而随时调整说明，因此可以说在展览功能和实用上都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我们也希望通过高科技在展览上的应用能够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打破已有的、固定的展览模式，在故宫博物院藏品展示方面迈出新的一步。

信息化管理区。管理区内不仅设置有多点视频监控系统，方便管理人员全面监控展厅内部情况，而且所设多点定位应急广播系统还能够方便管理人员及时疏导观众。

从新的“珍宝馆”到“陶瓷馆”，一个个专馆的建立，反映出故宫博物院在展览业务上的探求，体现着故宫博物院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和水平方面的提高。我们深知，这是个永无止境的事业。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地有所创新，有所进步，力求不辜负公众的期望。

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概况

耿宝昌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基础上创立的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品宝库。在100多件丰厚藏品中，陶瓷器约占45万余件（其中包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的约10万余件），而且陶瓷藏品中的绝大多数为原清宫旧藏的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明、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1949年以后，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拨交、私人捐献以及流散文物征集等渠道，原清宫旧藏陶瓷得以充实、补缺。故宫所藏中国古陶瓷的最大特点是流传有绪、品种齐全、数量庞大、质量精湛、真实可靠，这是世界上其它任何博物馆或美术馆所不能比拟的。

宫廷收藏陶瓷器至迟可上溯至唐、五代时期，当时朝廷曾旨令一些产品质量优良的窑场烧造贡瓷，唐李肇撰《国史补》、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及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有河南、浙江向都城长安进贡白瓷和青瓷的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河北邢窑白瓷中有署“盈”字、“翰林”款者，应是唐代宫廷内皇帝私库“百宝大盈库”和负责承旨制诏的“翰林院”专用器的标志。五代至北宋早期，吴越国钱氏统治者为了保全一隅江山，曾向中原朝廷大量进贡越窑秘色瓷。宋代朝廷先是旨令几个烧瓷质量较好的窑场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后又专门设立汝窑、钧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等官办瓷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官窑瓷器一旦烧成，就经严格挑选直入宫廷，一般不得作为商品出售，落选者也要砸碎后集中深埋，不得流人民间。个别官窑瓷器只有在“供御拣退后方许出卖”。北宋灭亡时，宫中所藏铜器、玉器、瓷器等各类文物，大部分被金人掠至上京，后又转运至中都（今北京），另有少部分随宋室南迁至临安。南宋时，临安朝廷崇尚侈靡，宫中对各类艺术品的聚藏复渐增盛，其中即包括大量各地名窑瓷器。

元代蒙古人统一全国后，南宋宫廷收藏的宝物被转运至大都（今北京），

并集金中都之收藏为一体，成为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之基础。

明代初期，宫廷已收藏数量可观的宋代名窑瓷器。《宣德鼎彝谱》曰：“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明、清两代朝廷均在景德镇设御器（窑）厂，并选派督陶官驻厂监造，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使用最优质的原料，不惜工本，大量烧造宫廷用瓷，从《明史》、《明实录》、《大明会典》、《江西省大志·陶书》、《瓷务事宜示谕稿·序》、《陶成纪事》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看，其烧造数量十分惊人。如宣德八年（1433年），应专掌御膳的机构“尚膳监”之要求，一次烧造各样瓷器443500件（《大明会典》卷一九四）。成化年间（1465～1487年）虽无确切的数字可查，但“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史》卷八二，志第五八，食货六）。正德年间（1506～1521年），朝廷曾两度委派宦官至景德镇监督烧造10余万件瓷器。嘉靖（1522～1566年）、隆庆（1567～1572年）、万历（1573～1620年）时期，朝廷更是接连不断地下达烧造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共烧造瓷器65万余件，隆庆朝12万余件，万历五年至二十二年共51万余件。清代御窑厂的烧造数量更大，仅雍正六年（1728年）至十三年就“计费帑金数万，而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瓷务事宜

示谕稿·序》）。这些御用瓷器进入宫廷以后，虽有不少因日常使用或随着朝代的更替而被损耗、散失，但仍有相当多一部分被妥善保存下来。

经过明、清26代帝王在540多年间的积累，至清末皇宫内保存的陶瓷器达数十万件之巨。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这些瓷器中的绝大多数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国内外其它一些博物馆及私人手中也有零星收藏。仅北京故宫博物院即收藏原清宫旧藏瓷器约32万件，其中包括大量闻名于世的珍品和孤品。如：

唐代邢窑白釉花口碗，造型优美，釉色洁白如雪；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釉呈淡天青色，恬淡雅致；宋代哥窑青釉鱼耳炉，造型古朴，“金丝铁线”交织如网分割釉面，自然天成；宋代官窑青釉弦纹瓶，釉色粉青，釉层肥腴，美若古玉；宋代钧窑月白釉出戟尊，釉色月白，古朴典雅；宋代龙泉窑青釉凤耳瓶，釉色青翠，美若翠竹；宋代定窑白釉孩儿枕，釉呈象牙白色，以胖娃的背部作枕面，憨态可掬；元代蓝釉白龙纹盘，以天然蓝宝石般的釉色衬托白龙，异常醒目；明代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砂足滑底，造型稳重，是目前仅见的署永乐年款的永乐官窑青花瓷器；明代宣德青花蓝查体梵文出戟法轮盖罐，造型奇特，青花发色艳丽，是皇家设置坛场的法物；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造型娟秀，胎薄体轻，色彩淡雅，备

受后人赞赏；明代弘治黄釉金彩牺耳罐，釉色娇嫩，金彩奕奕，是皇家祭祀用器；万历五彩镂空云凤纹瓶，色彩绚烂，华丽至极；清代康熙紫红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图案色彩逼真，传世仅此一件；清代雍正珐琅彩雉鸡牡丹纹碗，胎体薄如蝉翼，绘画精细入微，可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乾隆各色釉彩大瓶，形体高大，集各种釉、彩于一体，博得“瓷母”之美誉。

1949 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新入藏的陶瓷器中亦不乏精品，其中有些原本就是清宫旧藏品。例如，国家曾将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以前抵押在盐业银行的部分瓷器，复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著名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孙瀛洲先生（1893～1966 年）在从 1956 年至 1966 年的 10 年间里，先后将个人收藏的 2000 多件陶瓷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先生（1892～1969 年）、韩槐准先生（1892～1970 年）亦曾分别将个人收藏的晋唐青瓷、明代外销瓷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如此实例，不胜枚举。

如今，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中国陶瓷可谓自成一体，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到现代陶艺家作品，无所不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陶瓷生产 8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历史。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人们不断地去整理、研究、发扬、光大。

中国古陶瓷美的历程、欣赏与展示

吕成龙

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瓷器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早在距今1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制作和使用陶器。虽然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如古埃及、叙利亚、印度等，也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制作陶器，而且后来制陶技术都得到高度发展，但是，它们都没能发明制瓷技术，瓷器的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

瓷器是中国先民在长期从事陶器生产的基础上所发明的。中国瓷器生产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品种繁多、质地优良，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颂。如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1]来形容当时越窑秘色瓷的釉色像翠绿色山峦一样美丽。唐代另一位诗人顾况（约715～814年）用“越泥似玉之瓯”^[2]来比喻越窑青瓷像玉一样润泽。中国瓷器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和珍视，并被许多国家仿制。普鲁士皇帝选皇后的故事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1713年至1740年间，普鲁士皇帝曾以600名萨克逊近卫军向邻邦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生产的瓷花瓶，用来为他的婚礼增色，这些花瓶至今还陈列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中，被人们称为“近卫花瓶”。中国素有“瓷国”之誉，英语中的China既指中国，亦指“瓷器”。由此可见，中国瓷器在世界上影响之深远。

美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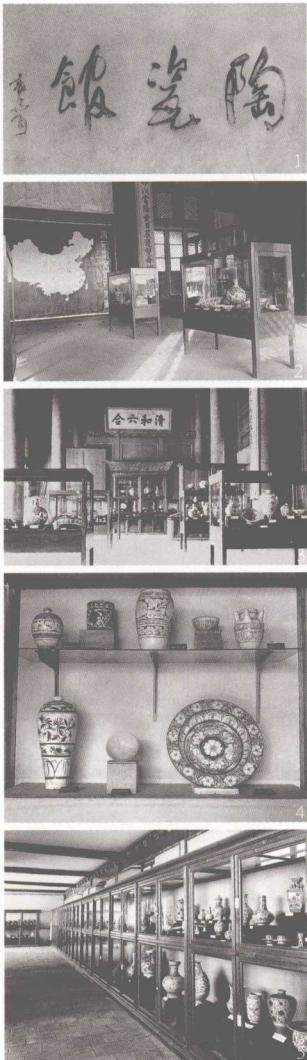
一般来说，瓷器的成功烧造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一是使用瓷土；二是烧成温度要达到1200℃以上；三是器物表面要施高温釉。关于我国何时发明瓷器，20世纪70年代曾在中国考古界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发明于商代，有人认为发明于六朝时期，还有人认为发明于唐代。最终借助于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考古学家将瓷器（青瓷）发明的时间定在东汉，这是以考古发掘资料和科学化验数据为依据的。首先，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余姚等地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青瓷窑址，而且这些窑址出土的青瓷器与浙江、江苏等省的东汉纪年墓出土的青瓷器可以相互印证。其次，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出土的一件印花斜方格纹青瓷罍残片进行测试分析，证明其烧成温度、显气孔率、吸水率、抗弯强度、烧结程度及胎釉结合程度等都已符合现代瓷器标准^[3]。至于早在商代中期就已发明并延续烧造至西汉时期的施青釉的器物，因其胎料的纯度、烧成温度、胎釉结合程度以及机械强度等都略逊于现代瓷器标准，故被视为瓷器诞生以前过渡时期的产物，称之为“原始瓷器”。因此，若从东汉发明瓷器算起，中国的瓷器生产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瓷器自东汉在南方首先出现以来，即以其耐高温、易清洗、美观雅致等优点，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生产获得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制瓷区域由南方扩大到北方，瓷器的胎釉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造型式样日渐增多，装饰方法和题材越来越丰富，烧造技术亦更加成熟。从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物可以看出，瓷器已逐渐替代青铜器、漆器、陶器等，成为当时最主要的随葬冥器，这说明

瓷器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用具。纪年墓出土物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瓷器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均有其演变规律：在造型方面是由矮胖向瘦高发展；在装饰方面，三国至西晋时盛行的在器物上用模子压印的由花蕊、联珠、网格、菱形等图案组成的带状纹饰，沿用至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即趋于消失。约在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开始出现的在青瓷上涂点褐色斑点的装饰技法，至东晋时颇为流行。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达到兴盛。南朝造佛像皈依佛门之风极盛，晚唐诗人杜牧《江南春》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4] 盛极一时的佛教艺术在当时的青瓷上也有所反映，如南北朝青瓷上盛行刻划莲瓣纹、忍冬纹等，特别是目前已发现的十多件集模印、塑贴、刻划技法于一身的青瓷仰覆莲花尊，形体高大，通体饰仰覆莲花瓣及菩提树叶、忍冬纹等，成为这一时期青瓷器上盛行佛教艺术题材集大成的代表作。南北朝时期青瓷莲花尊在南、北方均有烧造，特别是1948年河北省景县封氏墓群曾一次出土4件，其中的两件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江南地区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中常出土一种青釉谷仓，这种谷仓是由汉代的五联罐演变而来，其上堆塑各种人物、飞禽走兽等。1976年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出土一件青釉谷仓^[5]，其上堆塑的龟驮碑上刻划“元康出始宁，用此罍，宜子孙，作吏高，其乐



1. 1959 年郭沫若先生为陶瓷馆题写的馆名

2.3. 20世纪 50 年代位于慈宁宫的陶瓷馆陈列

4. 20世纪 60 年代位于承乾宫的陶瓷馆陈列 (宋、金磁州窑系瓷器陈列)

5. 20世纪 50 年代慈宁宫庑房瓷器陈列

无极”，可知六朝时人们称这种器物为“霤”（音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青釉谷仓，系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谷仓上部堆塑崇楼、亭阙、人物、鼠、鸟、鹿、猪、龟、鱼等，腹部刻划狗、鱼、龙等纹饰，及“飞”、“鹿”、“句”、“五种”等字样，龟驮碑上刻划“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二十四字。“永安”是三国时东吴景帝孙休的年号，“永安三年”即 260 年。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立体雕饰，展现了 1700 多年前江南吴国庄园五谷丰登的场面，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用它来随葬，是当时人们迷信思想所致，其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超度逝者亡灵。

我国在北朝时期还成功地烧造出白瓷，这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1958 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 年）车骑将军范粹墓出土的一批白瓷^[6]，胎体洁白，釉面莹亮，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白瓷。

隋代瓷器生产以青瓷为主，其造型基本上沿袭南北朝青瓷，盘口瓶、高足盘是其中的典型器。在施釉工艺方面，一般器内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其装饰技法有刻、划、印、塑贴等。装饰题材常见有莲瓣、复线、朵花、花叶、忍冬等。《隋书·何稠传》载：“何稠，字桂林……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骑射侍郎。”说明当时何稠能以青绿色瓷器模仿琉璃并达到乱真的程度。

隋代白瓷产量不大，但从西安隋代李静训墓^[7]、郭家滩隋代姬威墓^[8]、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9]出土的白瓷盖罐、白瓷龙柄鸡头壶、白瓷双龙耳尊等来看，均造型优美，釉面光洁，反映出当时白瓷生产技术已达较高水平。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唐、五代是个辉煌时期。首先表现在瓷器生产之繁盛，见诸考古报道的瓷窑数量即数以百计，分布在如今之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四川

等省，其中又以河南、浙江最为密集。窑场既然众多，竞争就不可避免，一些瓷窑的产品上开始刻划或书写广告用语，如“丁道刚作瓶大好”、“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杜家花枕”、“裴家花枕”等。在激烈的竞争中，涌现出越窑、邢窑、长沙窑、鲁山窑等一批著名瓷窑，它们所产瓷器均以其独特的风貌饮誉当代，光耀千古。其次，唐、五代瓷器不但品种增多，而且更讲究作工之精细、造型之优美。造型多模仿当时的金银器，显得精致典雅。唐、五代瓷器的胎骨更加坚实致密，叩击时能发出金石之声，唐代宫廷乐师曾用越窑青瓷碗和邢窑白瓷碗充当乐器，奏出美妙的音乐。唐人段安节于9世纪80年代所作《乐府杂录》曰：“武宗朝，郭道源后为凤翔府天兴县丞，充太常寺调音律官，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筯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咸通中，有吴缤洞晓音律，亦为鼓吹置丞，充调音律官，善于击瓯。”^[10]

浙江的越窑青瓷是传统青瓷的典范，河北的邢窑白瓷是新兴白瓷的代表，今人常以“南青北白”来描述唐代瓷器的概况，这是从地域方面大致划分，实际情况还要丰富得多。从目前已调查过的唐代窑址情况看，烧青瓷的窑占70%以上，可见唐代瓷器生产仍以青瓷为主。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从饮茶的角度对当时的青瓷窑进行了一番品评，即：“碗，越

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11]陆羽将越窑青瓷评为第一。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施肩吾、皮日休、孟郊、顾况、郑谷、韩偓、许浑等也都曾赋诗赞美越窑青瓷，说明越窑青瓷在当时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越窑青瓷中质量最精者被称作“秘色瓷”。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时曾出土13件越窑青瓷^[12]，同时出土的衣物账石碑上有咸通十五年（874年）镌刻的碑文，碑文在记载唐懿宗赐给释迦牟尼佛指舍利供奉物品中称这些瓷器为“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由此可见越窑秘色瓷等级之高。

唐代烧造白瓷的瓷窑有邢窑、定窑、巩县窑、耀州窑、密县窑等。但无论从烧造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首推邢窑，唐人陆羽《茶经》中有“邢瓷类银”、“邢窑类雪”之品评。唐人李肇撰《唐国史补》曰：“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13]唐代邢窑曾为宫廷烧造过贡瓷，其中刻划“盈”字及“翰林”款者，分别为宫廷内“百宝大盈库”及“翰林院”的订烧器。

唐代瓷器除了青、白两种釉色之外，还有黄釉、黑釉、花釉及茶叶末釉、素地黑釉花、白釉绿彩、珍珠地划花、白釉釉下蓝彩、青釉釉下褐（绿）彩等。唐代还生产三彩釉陶。唐代花釉瓷简称“花瓷”，其中的花瓷腰鼓在当时曾用作宫廷乐器。唐人南卓在宣

宗大中二年（848 年）及四年所作的《羯鼓录》中谈到唐玄宗及其宰相宋璟都善于击羯鼓，并以绝技著称，二人曾在一起讨论鼓事，比较羯鼓与腰鼓声音之优劣，即：“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鼓事，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且臻（shèng）用石末、花瓷，同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14]唐代长沙窑以烧造釉下彩绘瓷而独树一帜，既有单一的青釉釉下褐彩、青釉釉下绿彩，亦有二者合用的青釉釉下褐、绿彩。所绘人物、花鸟、飞禽、走兽等，生动传神，意境深远。长沙窑瓷器上还盛行题写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联句、单句、谚语、成语、俗语、广告用语等，以五言诗最为多见。其内容或描写游子的心情，或抒发离别相思，或反映边塞征战，或赞美春天美景，或反映科举制度，或提醒人们注意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节，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其中的一首“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开。家中无学子，官从何处来”。宣扬的就是读书做官论。

唐三彩创烧于唐高宗时期（650～683 年），盛唐时（713～755 年）达到极盛。唐三彩的盛行与唐代流行厚葬风俗有很大关系。按唐代文献记载，最高统治者及其下属官僚死后，按官位等级发放随葬冥器，如三品以上 90 件，五品以上 60 件，九品以上 40 件。

另外，唐三彩之所以受到唐人的喜爱，是因为其丰满雄浑的造型和斑驳华丽的色彩，最能体现大唐盛世雍荣大度的气魄，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

宋、金时期是我国瓷器生产的一个高峰期，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需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宋代政府重视对外贸易，曾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设市舶司，拓宽了中国瓷器在海外的市场。1949 年以来所发现的宋代瓷窑遗址分布于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的 140 多个县。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涌现出了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等一批著名瓷窑。这些瓷窑的产品在造型、釉色、装饰诸方面，都各具特色，在市场上备受消费者喜爱。宋、金时期一些著名瓷窑的工艺技法被邻近甚至较远地区的瓷窑所模仿，形成一些庞大的瓷窑体系。北方有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系等；南方有龙泉窑、越窑、景德镇窑、建窑系等。在民窑生产大发展的基础上，朝廷先是诏令一些产品质量较好的瓷窑如定窑、耀州窑等烧造贡瓷；然后又在某些瓷区设置“官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如汝窑、官窑、钧窑等。因此宋代瓷器形成官、民两种绝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造型方面，官窑瓷器多仿古铜器、金银器或玉器，形体规范，尺寸严格，古朴典雅；民窑瓷器造型则灵活多变，讲求实用。在装饰方面，官窑瓷器以釉质取胜，崇尚朴素，追求韵味；民窑瓷器则讲求

刻、划、彩绘等装饰方法的多样化，以适应人们的各种审美需求。

谈论宋代瓷器常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说，此说源自明代《宣德鼎彝谱》一书，书中曰：“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15]由于柴窑不但不属于宋代，而且至今仍是个谜，因此，人们就逐渐不提柴窑，只提五大名窑。五大名窑虽不能涵盖宋代瓷业生产的全貌，但却集中体现了宋代的制瓷水平。汝窑瓷器传世稀少，目前存世不足百件，其特点是青灰色胎，淡天青色釉，裹足支烧，胎体较薄，工艺考究。尤其是恬淡滋润的淡天青色釉，给人以幽玄静谧的视觉感受，充分体现出宋代社会追求清淡含蓄的审美趣味。官窑瓷器，澄泥为范，胎色铁黑，釉色粉青，釉层莹澈，如冰似玉，极其精致，“紫口铁足”更增添其古朴典雅之美感。哥窑瓷器充分利用釉面开片美化自身，“金丝铁线”迂回穿插，交织如网，使平静的釉面产生韵律美。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主产白瓷的瓷窑，产品常以刻花、划花、印花或描金花进行装饰，有“定州白瓷瓯，颜色天下白”之美称。钧窑所创烧的玫瑰紫、海棠红等铜红窑变釉，如诗如画，绚丽斑斓，为瓷器的高温色釉装饰开辟了新的途径。人们曾用“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形容钧釉之美妙。

元、明、清时期，中国的陶瓷生产呈现出新的格局，主要表现在江西省景德镇的制瓷业凭借天时、地利迅猛发展，逐渐显示瓷坛霸主的实力。自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16]掌管烧造官府用瓷开始，瓷器生产的重心就逐渐向景德镇转移。明、清时，朝廷又在景德镇设御器（窑）厂，遣官驻厂督造，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垄断优质原料，不惜工本地大量烧造宫廷用瓷。由于各朝皇帝的审美趣味不同和社会时尚不断变化，促使工匠们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致使瓷器的花色品种层出不穷。官窑的繁盛带动了民营瓷业的迅猛发展，致使明、清时天下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镇，景德镇也因此而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元、明、清时期的钧窑、磁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等虽还在继续烧造日用瓷器，但与景德镇窑相比，无论在产量、质量、品种还是产品销路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了。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由于元政府实行“匠户”制度，对有一技之长的工匠比较重视，又加强了对外贸易，致使陶瓷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早在元王朝统一中国的前一年（至正十五年，即1278年），元朝统治者即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传世或出土的署“枢府”或“太禧”铭款的卵白釉瓷器，就是在浮梁瓷局监督下为“枢